

小說軒

浮世畫廊
——
儒林外史的人間

張國風著

中華書局

浮世畫廊——儒林外史的人間

張國風著

中華書局

叢書策劃：鍾潔雄 插圖：丁聰等

責任編輯：胡堯芳



書名：浮世畫廊（小說軒）

——儒林外史的人間

叢書主編：劉逸生

著者：張國風

出版：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
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-452 號

印刷：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 75 號

版次：1988 年 6 月初版

© 1988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369 8

關於“小說軒”的幾句閒話

我常覺得，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，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、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，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。因為從六朝志怪、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，上下一千五百年間，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，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。在這裏面，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廣泛的，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，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，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；從那裏面，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、感情内容、風俗習慣、社會心理、宗教信仰……生動而又具體。假如說，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線和緯線，那麼，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。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《人間喜劇》，說：“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四周，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，從這個歷史裏，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，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、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。”

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：“吾猶自記十一歲讀《水滸》後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……嗟乎！人生十歲，耳

HWT12/10

目漸吐，如日在東，光明發揮。如此書，吾即欲禁汝不見，亦豈可得。今知不可相禁，而反出其舊所批釋，脫然授之於手也，夫固以爲《水滸》之文精嚴，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。汝真能善得此法，而明年經業既畢，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，其易果如破竹也……”

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《忘山廬日記》裏面的這段話：“燕公謂：小兒教之讀書通文，自有捷徑。自言其女十歲時，尚不識字，十一歲起課以《十三經集字》，日識四十字，兼爲解字義，半年已能自閱《三國演義》（說部最佳書），即爲講《左傳》，使讀，不令背誦，甫讀完，能成數百言。嗣爲解《國語》及《史記菁華錄》，三書訖，能自覽御批《通鑑》。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，更不難。”

隨手舉這三例，都是經驗之談。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，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，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。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，進而泛濫及於小說。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，後頗衰落，雖餘風不斷，而佳構頗鮮。自金聖嘆以後，毛宗崗尚可一觀；至於《紅樓夢》的脂批，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，護花主人之流，便已俗不可耐；馮鎮密、但明倫也批《聊齋》，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；還有一些道士、居士，以《西遊記》爲“證道之書”，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。可見評點小說，雖曰“小道”，也大有“才難”之嘆。近數十年，考證小說之學崛起，胡適之、鄭振鐸、孫楷第、

阿英諸公，各有擅長，已脫離評點，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，是另外一門學問了。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、藝術性評論的，自王國維《紅樓夢評論》以來，長篇短章，琳瑯滿目，但也不屬於評點。這門學問，說深不深，說淺不淺，如今還沒有一個“金聖嘆二世”出現，不禁使人有“江山寂寥”之感。

然而，除了評點、考證、評論，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，即所謂“漫話式”的。本世紀四十年代，由孟超撰文、張光宇插圖的《水泊梁山英雄譜》，是這一方面的力作。其好處就在於“漫”。“漫”也者，似不經心而實經心，似非着力而又着力，似諧而莊，笑中有淚，“正經學問”外又一獨立王國也。畫之有“漫”，話之有“漫”，詩之有“打油”，樂曲之有“狂想”，戲劇之有“插科打諢”，武術之有“猴拳”、“醉拳”，凡此種種，無不是的。若著述之“漫”，則又縱橫開闔，無格可循。換言之，古典小說的漫話，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，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；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，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；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，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。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，視事件之是非而予奪，有《春秋》之微言，無腐儒之膠柱，淺者自見其淺，而深者則見其深。至於文字形式，則更不拘一格，謂之小品也可，謂之“野狐禪”亦可，或如師友晤對，或似書札往來，平凡之中，偶有警語，閒扯之際，忽現閃光：此便是所謂“漫話”。一千五百年間，

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，但是，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，却似鳳毛麟角，少而又少。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，忽發宏願，有“中國古典小說漫話”的擬題，而美其名曰“小說軒”，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。論其形式與內容，實在不妨稱之為“小說的小說”，蓋“小說”者，異於正史者也；這裏的後一個“小說”，則又異於評點、考證、評論者也。因其為“小”，可以易於涉趣，也易於入目；因其為“小”，亦可避免“正襟危坐”，作出“純儒”的姿態。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。說到有無價值，本也難說，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，對成人來說，有增廣見聞之功，只這兩項，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。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，是不是於評點、考證、評論之外，更能立一新的部目，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？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。

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。

劉逸生

寫於羊城的寓廬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

目 錄

偉大也要有人懂·····	1
身世清白的書·····	4
細說王冕·····	8
不朽的勾當——下鄉訪賢·····	15
周進和范進·····	20
胡屠戶——最佳配角·····	30
奪產記醜·····	38
《外史》中最可惡的人·····	46
名士世家·····	55
才子佳人·····	62
兩位才女·····	72
沒有愛情的故事·····	75
末代信陵的煩惱·····	83
公子求賢記·····	89
匡超人傳奇（上）·····	93
匡超人傳奇（下）·····	98
杭城名士酸氣多·····	105
豪情潘三哥·····	111
書中第一等下流人物·····	118
仗義偏多屠狗輩·····	126
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·····	133

末世才子·····	141
禮貌與虛偽·····	149
燈籠的排場·····	153
吳敬梓筆下的和尚·····	157
吹牛大全·····	161
《外史》中的逆反心理·····	167
科舉落第後·····	173
世紀末的信仰危機·····	180
金錢啊，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！·····	185

偉大也要有人懂

魯迅最推崇的小說，無疑是吳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了。從來的古典小說，都未能像《外史》那樣，得到魯迅那麼多的讚譽、那麼高的評價。從來的古典小說的作者，都未曾像吳敬梓那樣，使文學家兼思想家的魯迅如此折服。

魯迅認為，《外史》問世以後，“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。”換言之，《外史》誕生以前，還沒有一部小說，能夠稱得上是真正的諷刺小說。魯迅又說，“在中國歷來作諷刺小說者，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”，“諷刺小說從《儒林外史》而後，就可以謂之絕響。”可見吳敬梓的《外史》是一部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的古典諷刺巨著。

一九三五年，魯迅曾經在《葉紫作〈豐收〉序》一文裏，針對一些看不起《外史》的人，不無諷刺地發出了這樣的感慨：

偉大也要有人懂。

魯迅諷刺了那些看不起《外



魯迅的雜文辛辣而警世，至今無人能企及，然其對《外史》亦譽之為絕響。

史》的人們，蔑視了他們的“蔑視”。五十年過去了，知道並喜歡《儒林外史》的人越來越多了，而《外史》的研究、吳敬梓的生平研究，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。但是，《外史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，與《外史》在中國文學史，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相比，依然是不成比例的。《外史》研究的規模非但遠不及與它同時誕生的《紅樓夢》，而且也比不上其他



極其珍貴的甲戌本
《石頭記》手抄本。



《水滸傳》——
俠義小說的經典。

幾部古典小說名著，如《聊齋志異》、《水滸傳》。可以說，《外史》的偉大，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“偉大也要有人懂”，魯迅的話果然不虛！

《外史》之所以使魯迅如此折服，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。

魯迅一貫認為，“‘諷刺’的生命是真實”，“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‘諷刺’”。而《外史》的偉大，首先就在於它那無情的、深刻的真實。從未看到小說的作者具有吳敬梓這樣撕開假面、直

面人生、正視現實的巨大勇氣；從未看到小說的世態描繪像《外史》這樣接近真實的生活。在清代，《外史》被人視為洞察世態人情的教科書。在臥閒草堂本的評語中，就引着當時人這樣的評價：

慎毋讀《儒林外史》，
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
而非《儒林外史》。

人們正是天天生活在那麼一個醜惡的、而又誰也不覺其醜惡的“日用酬酢之間”。由《外史》

的諷刺、由《外史》的世態描繪，意識到、警覺到自己身邊那實實在在的社會諷刺性的存在，這難道不是對於《外史》藝術真實性的最高讚揚嗎？正是在這一根本點上，吳敬梓的小說和以往的諷刺小說拉開了明顯的距離，使它們望塵莫及。

魯迅特別欣賞《外史》那種“感而能諧、婉而多諷”的藝術風格，欣賞作者把辛辣的諷刺融化在不動聲色、似乎是無動於衷的客觀描繪裏。魯迅最看不起那種洩露的諷刺，所以，他責備晚清的譴責小說《官場現形記》，說它“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”（“文木老人”即吳敬梓）。

吳敬梓勾勒人物，描摹世相的高明藝術，使魯迅讚嘆不已。魯迅稱讚《外史》中的芸芸衆生，“皆現身紙上，聲態並作，使彼世相，如在目前”，“燭幽索隱，物無遁形”。

《外史》的諷刺與魯迅對諷刺的看法是如此合拍，難怪魯迅要給它那麼高的評價了。魯迅無疑是從《外史》的諷刺中得到了很多啓發。他那匕首投槍一般的雜文，他小說中不時可以看到的諷刺，不也時常表現出一種“感而能諧，婉而多諷”的風格嗎？從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身上，不可以依稀辨認出周進和范進的影子嗎？



身世清白的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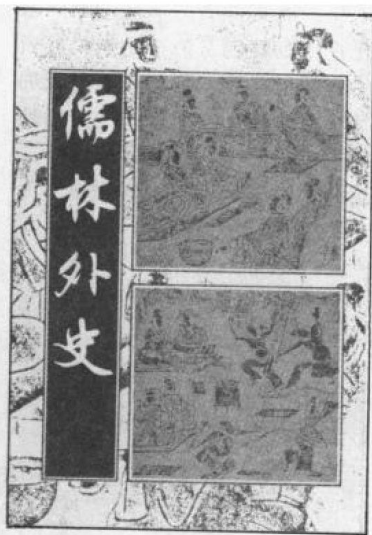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，歷來有知人論世的傳統。文學史的專家無不精通歷史。歷史學家也常常涉足文學。從王國維、陳寅恪到郭沫若、吳晗、向達這些學者，人們很難判斷，他們的歷史知識和文學史知識，究竟哪一方面更多一些。在他們那裏，不但是“六經皆史”，而且簡直是“文學皆史”。

知人論世的傳統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中，首先表現為確認作者，確認其作品，並進一步研究其生平的巨大興趣。“曹學”的研究比“紅學”的研究更引人注目，作家生平的研究比作品的研究被認為更有價值。在一些人那裏，對作者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作品本身的興趣。

對於《外史》來說，沒有尋找作者的苦惱。沒有一位專家或學者對吳敬梓的著作權表示懷疑。光是這一點，《外史》就已經算是十分幸運了。

吳敬梓的生平基本上是清楚

的，爭議不多。他為我們留下了一本《文木山房集》，他的佚文不斷地被發現。此外，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吳敬梓的很多親朋好友對《外史》作者的介紹。其實，



身世清白的《儒林外史》

光是一部《文木山房集》，就足以使曹雪芹的研究者們羨慕不已。他們找到一點間接的材料，

都那麼欣喜若狂，相比之下，極是可憐。

在《外史》的研究園地裏，有分歧，但並不嚴重。比起其他一些古典小說的研究園地來，簡直可以說是風平浪靜。各家的意見大同小異，聽不到甚麼怪談妙論。在平靜的爭論中的各家意見，猶如溪流中的石子一樣，磨掉了它們各自的棱角，變得愈來愈相似。這固然減省了不少麻煩和苦惱，但同時也增添了幾分寂寞。

經過學者、專家們的辛勤努力，吳敬梓的一生軌迹已大致清楚。甚至軌迹的起點和終點（1701——1754）也是那麼明確和肯定。各種文學教科書和文學辭典上，都放心地書上了吳敬梓的生卒年，數字的右下角也沒有令人討厭的疑問號。一般地說，作者的生卒年有那麼一兩年的誤差，似乎沒有多大關係。但是，如果我們要召開一個吳敬梓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紀念大會，那麼，確定吳的卒年就成為必要的前提。大家意見一致，事情自然就好辦了。倘若有人認為吳的卒年不是一七五四年，而是一七五五年，那麼，他那個紀念大會就得晚一年去開。

遺憾的是，很多著名的古典小說家由於生卒年的含糊，還很難召開這樣的紀念大會。不僅如此，有些著名的古典小說，連它的作者是誰都不清楚，更談不上甚麼生卒年和紀念大會了。

《金瓶梅》的署名是“蘭陵笑笑生”。這位“蘭陵笑笑生”

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	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	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	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	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	金瓶梅詞話序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蘭陵笑笑生是何許人，至今仍衆說紛紜。

究竟是誰？時至今日，還是一個謎。現在很多人想揭開這個謎，

發了不少文章，有的還出了專著。他們都寫得頭頭是道，入情合理，真叫人願意相信。然而，他們又那麼互不相容，難以共存，真叫人無所適從。人們常常把文學史上的考證比作偵探的破案，這確實是一個恰當而有趣的比喻。在推理的嚴密、想像的豐富與大膽等方面，《金瓶梅》的考證和《福爾摩斯探案》、《月亮寶石》、《東方特別快車上的謀殺案》等偵探小說相比，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所欠缺的是，考證文章沒有偵探小說那麼驚險罷了。我想，讓考證家去破案，恐怕未必比大名鼎鼎的福爾摩斯或布洛差到哪裏去。儘管如此，一般人總是半信半疑地注視着考證家絞盡腦汁得到的成果。他們囿於自己十分有限的抽象能力和想像能力，不願意完全拜倒在理性分析的腳下。他們總是傾向於相信直接的證據。理性分析得出的結論，總是不能使他們死心踏地。間接的材料、拐彎抹角的考證，儘管其中可能凝結着更多的智慧和血汗，也難以讓他們確信不疑。他們固執而誠摯地幻想着、期望着，有朝一日，在山東、江蘇，或是別的一個甚麼不出名的地方，在明

代甚麼名士或王公的陵墓中，找到《金瓶梅》最早的本子。那上面明確無誤地記載着作者的真實姓名。到那時候，有關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一切考證文章都將化為灰燼，從此湮沒無聞。

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的作者似乎已成定論。假如有人膽敢“冒天下之大不韙”，要來推翻這一成說，恐怕會激怒一大批文人學士，形成羣起而攻之的局面。只要回憶一下有人否定屈原為《離騷》作者時所喚起的憤怒和輕蔑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然而，關於羅貫中、施耐庵的生平，我們又知道得多少？

《西遊記》的作者是吳承恩。近年來，頗有人對吳承恩的著作權提出了小心翼翼的懷疑。儘管一些《西遊記》的專家認為這種意見不值得加以理睬，然而，據說懷疑者也不是毫無根據的。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幾種《西遊記》的明刻本，都沒有吳承恩的署名。連“射陽山人”之類的字樣也沒有。人們只是在天啓《淮安府志·藝文志》上看到，吳承恩名下載有《西遊記》。這種目錄式的記載，簡省至極，人們對此不免有點兒遺憾。



疑，然而《西遊記》的成就却是衆所公認。儘管有學者對《西遊記》的作者存有懷

與《外史》同時的《紅樓夢》在這方面的情況也並不太妙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離曹雪芹愈近，我們就知道得愈少。曹雪芹的生平研究，至今還是一片假說之林。

至於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的著作權，更是衆說紛紜。

如此看來，《外史》真是古典小說中的幸運者。

細說王冕

《外史》第一回，作者按照中國古典小說常見的作法，借一個獨立的故事，向讀者暗示了他整個的創作意圖。

王冕是元明易代之際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。在元人徐顯的《稗史集傳》、明初宋濂的文集、清初朱彝尊的《曝書亭集》裏，都有王冕的傳。吳敬梓就是從這些文字中取得了創作的素材。《外史》第一回的寫法，也和一般的傳記相似。

三家所傳之王冕，細節上略有出入，互為補充，但王冕的基本面貌是一致的。根據三傳所提供的資料可知，王冕出身普通的農家，自小放過牛。他的父母大概都沒有甚麼文化，自然也就談不上甚麼家學傳統。王冕從小就刻苦好學，有驚人的記憶力。他由一個一般的農家子弟，轉而成為一個當時頗有影響的名士，主要是靠自學。

王冕鑽研過《春秋》諸傳，《周禮》，讀過古代的兵書。宋

濂在傳中許之為通儒。

王冕通經達古，又愛穿古服，他身上似乎頗有一點復古的氣息。然而，他又並不迂腐，對現實很關心。在太平景象的背後，他清醒地意識到了深藏着的社會危機。他向他的朋友作了天下將要大亂的預言。在將亂未亂的時候，他就預先將家室遷入山中。

王冕胸懷大志，“有當世大略”，頗有用世之心，很想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。他曾經“仿《周禮》著書一卷”，時時地揣在懷裏，不讓人看。到夜深人靜的時候，便獨自悄悄地把書取出來，挑燈朗讀，自己欣賞一番，然後撫書嘆息說，我王冕若不是已經到了遲暮之年，那麼，我就拿了這本書去拜見一位應命的真主。即便像古代伊尹、呂尚所從事的那種大事業，恐怕也未必作不成啊！王冕以伊、呂自許，把自己看作為能夠治國安邦的大政治家，他的政治抱負，以及他的不甘寂寞，不是一目了然嗎？